



齐鲁文化经典文库

农书译注



[元] 王祯 撰
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

山东出版集团

齐鲁书社

S-092.47

4

:1



齐鲁文化经典文库

农书译注



[元] 王祯 撰

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



山东出版集团

齐鲁书社

《齐鲁文化经典文库》

出版说明

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,数千年来,生长在这里的齐鲁人,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文明。首先是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地位突出、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秦诸子,其中影响尤著者大部分生长于斯;其后历朝历代,几乎都有引领潮流、成就卓著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等,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,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千古流传、影响深远的文化典籍。将这些记录着他们的思想、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、为一代代中国人所承继的典籍系统地予以整理出版,从而进一步扩大齐鲁文化的影响,提高其在当代人中的认知度,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、传承和弘扬,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鉴于此,我们向读者推出了这套“齐鲁文化经典文库”。该书的出版系由山东出版集团组织,具体工作由齐鲁书社负责实施。

通过有关专家论证,确定本“文库”的收录范围是那些由齐鲁籍人士(或有一说为齐鲁籍人士)著述的、已经独立成册、在中华历史文化典籍中堪称经典的著作;对像荀子这样原籍虽非齐鲁,但其主要政治生活是在齐鲁地域、其形成影响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著述也产生在这里的个别作家,其经典著作也酌情收录。

收录的作品均采用现代标点本,除小说、戏曲之外,其余作品尽可能加以注释,而对先秦典籍则多数予以今译,以便于读者

的阅读和理解。所收部分校注本因问世较早,其中难免存有时代的痕迹,诸如高亨先生的《周易大传今注》,陆侃如、牟世金先生的《文心雕龙译注》等,但这些著作是世人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注本,仍需得到我们的尊重。

对经典著述的整理出版绝非一日之功,因此,本“文库”在最初集中推出一批后,未出品种将陆续整理出版,谨此说明。

齐鲁书社

2009年3月

前言

《农书》，元代王桢撰，也称《王桢农书》。王桢，字伯善，山东东平人，生活于十三、十四世纪之间。元成宗元贞元年（1295）任宣州旌德（今属安徽）县令，大德八年（1304）调任信州永丰（今江西广丰）县令^①。王氏在两任县令期间，廉政爱民，劝导农业，颇著成效。其《农书》即在任职之时写成。假如以作者写自序之年为成书之年，则其书写成于1313年，但实际可能要早些。

《农书》全书分三部分：《农桑通诀》、《百谷谱》、《农器图谱》。三部分的次序，明代嘉靖本等《谷谱》殿后，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本（简称库本）等《百谷谱》居中。本译注即依库本次序。三部分自为起讫。自序称：“为集三十有七，为目二百有七十。”但就书中的“目”计算，“二百”实是“三百”之误。今就译注本统计，《农桑通诀》6集26目，《百谷谱》11集83目（11集从王毓瑚校点本），《农器图谱》20集261目，共37集370目。

三部分的写作先后，据戴表元《王伯善农书序》称，王氏调任永丰时送给戴氏的《农书》，只有《农器图谱》和《农桑通诀》两部分，还没有《百谷谱》。据书中《农桑通诀一·蚕事起本》说：“尝撰蚕事祭文二篇，以为祈报之礼。其文见《农器谱》。”透露着写《蚕事起本》时，已先有祭文二篇写在《农器图谱十六·蚕神》目中。又《百谷谱十·苕麻》称：“其沤曝之法，刮制之具，亦尝具述。见《农器图谱》。”也透露先写《农器图谱》，而后写《百谷谱》。

① 明嘉靖九年（1530）刻行的《王桢农书》移文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均称“丰城县尹”，误。王桢友人信州教授戴表元《王伯善农书序》称其“来宰永丰”，并称“丰、信近邑”。可丰城在今江西中部，与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和永丰远隔五六百里，不得称“丰、信近邑”。

惟《农器图谱一·授时指掌活法之图》又称：“此图亦见《农书》（按指《农桑通诀》），谓图为农器，故重出于此。”则似乎又是《农桑通诀一·授时篇》的《授时图》先写成，由于图视为农器，所以又把它重列在《农器图谱》中。但无论如何，《图谱》与《通诀》也许先后有交错，而《百谷谱》最后写成，当可肯定。三部分似乎原先并无整体规划，在写作过程中发觉有不足而后补写，也是可能的。《百谷谱》大概在永丰任内最后续成。

《农书》全书约计 13 万余字，插图 310 幅（一目中有两器或两图以上者，一器一图各以一幅计），从而使此书成为古代农书中，前所未有的、篇幅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农书。

书中《农桑通诀》是农学总论性质，自垦耕、播种、中耕、肥水管理，以至收获贮藏，都有所论述，兼及果木、栽桑，以及家蚕、蜜蜂和牲畜禽鱼的育养，可谓周备，而作全面性的分项论述，尤为独创一格。《百谷谱》是继总论后的栽培各论（库本列此为第二部分是合理的），谷物、蔬菜瓜类、果树、竹木、水生植物等，尤其棉花茶叶，都包括在内，确是兼收并蓄。

《农器图谱》是本书的一大特色，在现存的古代农书中，它是有突出成就的，而晚出的农书，也往往奉其为主臬。南宋的曾之谨曾经写过一部《农器谱》，书中分列耒耜、耨耨、车戽、蓑笠、铎刈、簦箕、杵臼、斗斛、釜甑、仓庾等十项，可惜原书现已失传。王书所列农器门类，与曾书相同而加详，大概是参照曾书而扩充很多。惟曾书只称“谱”，未题“图谱”，似乎是只有叙说而无图样，果真如此，则王书的绘“图”写“谱”，在我国传统农具的发展史上，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，所以特别值得珍视。尤其是有些农器为王氏所创制，更见其富有兴农热忱。今举数例，以表彰其苦心经营，如牛转翻车、水转翻车，“皆出新制”；水轮三事，“今创此制，幸识者述焉”；连磨，“世罕有传者，今乃寻绎搜索，……既图于前，复叙于后，庶来者效之，以广食利”；水排，“去古已远，失其制度，今特多方搜访，列为图谱，庶冶炼者得之，不惟国用充足，又使民铸多便”；水转连磨，因见到江西的茶磨茶碓，而创此连磨连碓农器，“诚济世之奇术”，等等。王桢还进一步实践制造新器，并作试验，例如水碓，“水利中未有此制，今特造立，庶临流之家以凭仿用，可为永利”；高转

筒车,“此近创捷法,已经较试,庶用者述之”。如此制造新器示范,并临流装置试验,不是徒然纸上谈兵,其为民众造福的热情,使人感佩。

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南北“比较农业”的反映。农业因地区、土壤、气候、水利条件等的不同,有其地区性,所谓因时因地制宜,历来重视。但不能囿于陈规,拘泥自茧,在照顾一定差别的条件下,更应南北互相学习交流,取长补短,以取得互利而提高农业生产。在这方面王祯是特别强调的,在所著的三部分中都有所述及,尤其在农器方面,反映得更多。这些例子,俯拾皆是,这里仅谈一件,如《农器图谱十六·蚕簇》比较南北簇蚕的方法,南方的屋里簇和北方的屋外露簇,各有利弊,而北方的露簇为害更大,王氏指出:“蒿薪积叠,不无覆压之害;风雨浸浥,亦有翻倒之[烦];复内外寒燠之不匀,或高下稀密之易所:以致簇内病生、茧少,皆由此故。习俗既久,未能遽革!”最后援引北宋梅尧臣《蚕簇》诗作结论:“竞畏风雨寒,露簇未如屋。”所论极为中肯合理。

基于全国通盘考虑的思想,王祯不同意“风土不宜”之说,他对甜瓜、苤苳、棉花的固守风土不宜提出批评,认为作物引种问题,关键在于栽培管理技术的是否合理。这种思想是元代官撰农书《农桑辑要》的作者之一孟祺首创,王祯赞同而继述之。此说深得明代徐光启的赞许。不过,风土所宜还是有的,岭南很多植物在今天也不能贸然移植于北地,孟、王所批评的,该是那些“唯风土论”的人吧。

二

王祯的生平事迹,今天留下的文献很少,但有两件比较重要,兹摘引以供探讨。其一是“元帝刻行《王祯农书》诏书抄白”^①,诏书是应江西等

^① 此“诏书抄白”不见于国内任何《王氏农书》刻本和各家书目,仅见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的一部嘉靖刻本中。诏书时间为“大德八年”(1304),提到《农桑通诀》、《农器图谱》、《谷谱》三部分俱全,但这一年是王祯调任永丰之年,还没有《百谷谱》,是为可疑。但这不影响祝将仕对王祯学问行迹的记述。

处儒学提举司副提举祝将仕^①的牒请刻印王书而下。祝将仕说：

切见承事郎信州路永丰县尹王祜，东鲁名儒，年高学博，南北游宦，涉历有年。

其二是王祜儒友信州教授戴表元写的《王伯善农书序》：

丙申岁(1296)，客宣城县(今属安徽)，闻旌德宰王君伯善，儒者也，而旌德治。问之，其法：岁教民种桑若干株，凡麻苧、禾黍、牟麦之类，所以蒔艺芟获，皆授之以方，又图画所为钱、镬、耒、耨、耜、耨诸杂用之器，使民为之。……他县为宰者群擲揄之，以为是殊不切于事。……如是三年，伯善未去旌德，而旌德之民利赖而诵歌之。盖伯善不独教之以为农之方与器，又能不扰而安全之，使民心驯而日化之也。后六年(1304)，余以荐得官信州(治所在今江西上饶)，伯善再调来宰永丰(今江西广丰)。丰、信近邑(广丰与上饶近在咫尺)。……伯善之政孚于永丰又加速，大抵不异居旌德时，山斋修然，终日清坐，不施一鞭，不动一檄，而民趋功听令惟谨。

祝氏称王祜“年高学博，南北游宦”。的确，王祜学问广博，其所涉览，经史、农书不必说，兼及诸子、医学本草、重要类书、笔记杂录，尤其熟识名人诗赋之类，信手拈来，运用贴切，从所著书中可以反映出来，所称“东鲁名儒，年高学博”，并非虚语。

至于说“南北游宦”，一般只知道他在江南做官，但从全书中搜索，宦游南北也确实颇有眉目。先说北方，例如铲，说：“今营州之东，燕蓟以北，农家种沟田者皆用之。”《铲诗》云：“尝见燕赵北，亦传辽池东。”《油榨》说：“今燕赵间创法……”《麦埤》说：“尝见北地……”《耕索》说：“今秦晋之地，亦用长辕犁(按指二牛抬杠)……如山东及淮汉等处用三牛四牛(按谓数牛合为一犍)。”这些地区，除山东是王祜原籍外，其余燕、赵、秦、晋、营州等地，均在今河北、山西、陕西及辽宁等地，而蓟在今北京，淮河、汉水也在长江以北。至于江淮之间，更是“愚尝客居江淮，目击其事”(《沙

① 将仕：官阶名，即将仕郎。

田》),书中“江淮”、“淮上”、“淮人”、“淮民”等提到很多,又说“今海陵人泥行……用之”(《橈》),海陵为今江苏泰州。可见王氏对江淮之间的农业情况尤为熟识。

再说江南,他足迹所及,非仅限于皖东南的旌德和赣东隅的永丰二县,江、浙、湘、赣等地区他都到过,诸如“余尝盛夏过吴中”(《薊马》),“今平江虎丘寺剑池……”(《高转筒车》)“尝见江东农家用之”(《耨锄》),“尝见浙间一种,谓之阴瓜”(《甜瓜》),“尝见于江浙农家”(《筛谷筛》),“尝到江西等处”(《水转连磨》),“今湖湘间收禾,并用笊架悬之”(《笊架》)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或者说,有的北方地区,也许只是听人传言,未必亲临其地。但无论如何,他“尝见”的地方不少,特别是“薊城”,即元代的都城(今北京),他可能淹留得比较久,因为那是他游宦“候差”的地区。而他在调任永丰县令时,已是“年高”(祝将仕语)。在首都长期候差的岁月中,他可能去过邻近的山西、燕北、冀东等地。《栗》目说到“愚尝见燕山栗”,是佐证之一。

下面再就戴《序》来考察。据《元史卷一九〇·儒学·戴表元传》,戴氏于大德八年(1304),年已六十余,始得荐举任信州教授。这年就是《序》中说的“后六年”,也就是王禎调任永丰县令之年。上溯“六年”前的三年是1295年到1298年,这三年就是《序》中称赞王氏因政绩好而百姓歌颂之的“如是三年”。而戴氏客居宣城在“丙申岁”,即1296年,则下距1298年只有两年,不足“三年”之数,以此可证,王禎始任旌德县令应从1296年上推一年为1295年,始合“如是三年”之数。事实上,这也符合实情,因为王氏不可能一到任便有善政传播到客居邻县的戴氏耳中,必须经过一年半载的时间。因此,我推定王禎始任旌德之年为1295年,到1304年调任离职,在旌德共连任九年。假如县令以三年为一任,则王禎在旌德连满三秩,足见其治绩深得民心,司部考核“优异”,故而秩满一再连任,这在元代的地方守令中是不多见的。

无独有偶,《王氏农书》自序写于1313年,上溯到1304年调任永丰也刚刚是九年。这是巧合,还是在永丰又连任九年,就不得而知了。但《百谷谱》似乎不应写了九年之久。因为王氏自称在旌德时“方撰《农书》”,

调任永丰时,“《农书》方成”(《杂录·造活字印书法》)。此所谓《农书》,据戴《序》实为《农器图谱》和《农桑通诀》两部分,不包括《百谷谱》,《百谷谱》是在永丰续写的。但到永丰后写《百谷谱》迁延九年之久,比前二部分要慢得多。王桢到永丰时已是“年高”,是否因此而迁延,还是写成《百谷谱》后隔一段时间再写自序,如果是后者,那末全书的写成,实际比1313年要早些。

三

王桢的为人和治民政绩,戴《序》中已有具体记述。这里需要考查的是所记是真实的呢,还是作序人的褒美之词?

先谈教民种艺和图画农器。《农书》中虽然没有将耕作栽培技术直接对农民“授之以方”,但书中所记实际都是这些内容,自然是间接在教导农民以种艺之法。农器指导操作技术,操作技术依赖农器,二者本为一体。王氏绘图写谱,本身就是为了教民种艺。

关于图画农器,只要寻绎原书,则为时代远隔,古器失传;为地区不同,他处未见;为同工而异器,取长补短;为减轻劳动强度和农民的辛劳;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普及农家利益,王氏特为多方搜索而图画农器者,不一而足;其余常器,更无论矣。其中并有直接命工制造者,例如《锋诗》:“兼材宜不废,图象付良工”;《耘耰诗》:“愿将制度付国工,遍使吾农资稼穡”;比较复杂的机械装置,如翻车,特别指出:“此车关键颇多,必用木匠,可易成造”;如水碓,“今特造立”;如高转筒车,“已经较试”,等等。则明显指出曾制造实器或作示范试验,以教民广用。戴《序》还记载:

(王桢)岁时属耆者、强壮,问能从吾言试其具;幸而能,则大喜,

出卮酒相劝奖;即不能,或怠惰不帅教,辄颦蹙,展转引愧,如不自容。王桢进行年终考核,老农或青壮年能使用某些农具时,则大喜而奖励之;如或不能,或者根本不听命时,则忧愧自责未能化民,但“不施一鞭”,不加威逼。假如没有戴《序》的提示,所谓“付国工”,所谓“造立”或“较

试”，也只是一看滑过，或认为是文人的意兴所及而增饰，今读戴《序》，乃可推知确有图样、模型或新农具颁发下去，若复杂机械则加以示范试验，使民仿效。

王禔为人澹泊，为政清廉，戴《序》言之凿凿。试就《农器图谱》中考察，有些简直像新石器时代的老古董，如老瓦盆、匏樽、瓢杯之类，殊不足以登大雅之堂，可他却称赞说“今瓦盆盛酒，有复古淳俭之风”，“今举匏樽，倾瓢杯，何田家之有真趣也”。如缶，其诗曰：“眷然还忆古遗风……好共农家老瓦盆，侑我田歌成一醉。”初疑其冬烘倒退，思想陈腐，联系他的一系列表现，却反映他淳真反朴，澹泊为怀的心情，戴氏所谓“山斋修然，终日清坐”的情态，跃然纸上。

正因为有这样淳朴寡欲的心情，所以他非常羡慕归隐江南鱼米之乡。如《长饒诗》：“我亦从今事兹器，东皋甘作力田人。”《陂塘诗》：“便当卜此成归计，鱼稻乡中好度年。”《农舟赋》：“吾将挈家于此而就食，听其所止于鱼稻之乡。”

书中多处反映其恤民之心，如描述梯田耕作的劳累，手耘、足耘的艰辛，“守舍”踧伏草窝的凄楚，《禾檐诗》：“才使颊肩到场圃，主家仓廩又催收。”《牛转翻车诗》：“日日车头踏万回，重劳人力亦堪哀。”等等。又往往以富贵与贫民对比，刺富而悯贫。例如刺富，《蚕室火仓诗》：“谁识贵家欢饮处，红炉画阁簇婵媛。”《缫丝冷盆诗》：“不似贵家华屋底，空教纤手弄清泉。”《蟠车诗》：“岂知罗绮辈，惟务拨琵琶。”等等。其悯农，例如《箠诗》：“今岁租粮毕，空虚奈尔何！”《阴沟（暗渠）诗》：“却嗟疏凿劳民力，安得鞭驱万鬼工？”三国吴时鲁肃慷慨资助周瑜军粮三千斛，《困诗》讥刺之：“只知不负英雄渴，遇歉能倾一济贫？”等等。

对胥吏的箕敛无厌，尤表现为痛心。如《宴诗》：“一朝催租急，肯许防饥凶？”《芟麦歌》：“自余宿负如取寄，指此有秋争蚁萃。一得岂能偿百费，终岁勤劳一歔歔！”《缫车诗》：“岂知县吏已催科，不时揭去无余绌。迫索仍忧宿负多，车乎车乎将奈何！”等等。王氏目睹农民的力瘁赋重，常自愧廩食公帑，未能给农民多做有益之事，如《耘盪诗》：“至若执笔公署

间,但仰廩支供口费。”《区田诗》:“竭来学制古侯邦,承恩例署兼农事(按,指县令兼署“劝农”职衔);带山田少(按,旌德、永丰均在山陵地区)缺食多,教不及民深可愧!”

自己清廉自守、自愧素餐者,必然对居官而不问民间疾苦者,予以讥刺抨击,如《守舍诗》:“世族多少居华堂,安然熟寝无更长,便腹何尝乏稻粱!”《芟麦歌》:“昨日公堂宴宾贵,尊俎横陈混肴馐,檀板珠绳按歌吹,万钱不直供一醉。庖人搓揉出精粹,尚喜食新夸饼饵。物不天来皆力致,饱食何人知所自?”尤其对那些浑浑噩噩而为民上者,给予强烈抨击,《农桑通诀四·劝助篇》揭露:他们不知衣食之所从来,惟以骄奢为乐,甚至苛敛无度,刮民脂膏以肥己。他们都兼署“劝农”职衔,自己不懂农事,怎能劝农?却假借“劝农”名义,没有下乡,先发公文告知各乡各社,一到乡间,便集合乡民,头会箕敛;满载而归!对这种欺上贼下的勾当,希望上面制订法规制裁,以杜绝流弊,则百姓幸甚!这些人正包括戴《序》指出的“他县为宰者群擲掄之”的那些人,自己尸位蝗食,反而讥笑他人为民尽职,难怪王氏看不顺眼,而描绘此辈的恣贪嘴脸,也可谓淋漓尽致。而王氏的长鞭所挥,还触及封建最高统治者,讥讽“时君世主”,虽然也有注意农桑的,然而田野没有完全垦辟,仓廩并未完全充实,游惰之民未见完全归农,这又是什么缘故呢?看来只是发了一纸“劝农”空文,而没有施行实际有效的措施吧!正因如此,他重在实际教民种艺之法,颁发农器图样使民仿造,所以他不发公文下乡扰民,戴氏所谓“不施一鞭,不动一檄,而民趋功听令惟谨”,似亦属实。不过,在元代蒙古贵族的高压统治下,汉人王桢竟敢影射蒙古“皇上”,可谓“胆大包天”,难能可贵。

王桢擅长写诗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其“铭、赞、诗、赋,亦风雅可诵”,清人顾嗣立选编的《元诗选》中选录他的农器诗不少。的确,他的诗赋等都写得好。一般说来,善诗者未必善农,善农者未必善诗,而王氏诗、农兼备,可谓多才多艺,非同一般。我们在农学上重实不重虚,对王书中附在每件农器后面的诗歌等,往往一溜过去,不值一顾,然而,仅就上面所举的少数诗例中,已足反映王氏的为人处世,道德涵养,喜、怒、哀、乐,好

恶分明,而这些在他的记实文章中是找不到的。所以,我们熟识王祯,研究王祯,在文献贫乏的情况下,对他的诗歌,尤其不能轻易放过,因为诗言志,诗为心声嘛。

王祯目芥菜为“蔬茹中之介然者”,生姜祛邪辟恶,“蔬茹中之拂士也”,其人澹泊清廉,耿介疾恶,或亦以自况欤?

四

金无足赤,书无完书。在肯定王祯著作的优点和成就之外,也应指出其中不足的一面。本书的优缺点,或许是二八开吧。具体缺点都已在校记、注释中指出,概括起来,可分作十二项说明如下。

一、引书张冠李戴

此类很多,又可分为:(1)书名,如《广志》误为《广雅》(《梁秫》),《韩非子》误为《淮南子》(《榘子》),《本草衍义》误为《本草图经》而又轻率截割去沙藏保鲜法(《栗》),等等。(2)篇名,如《周礼·乡大夫》误作《周礼·大司徒》(《孝弟力田篇》),《货殖传》误作《食货志》(《橘》)等。(3)作者,如王安石误作梅尧臣(《田漏》);陆元恪误作陆士衡(《芹藁》),因为二人同名“陆机”而致误等。(4)内容,如以《风土记》的“博士芋”误作《广志》(《芋》),以《本草图经》的内容当作《尔雅》郭璞注(《李》),等等。

二、引文割裂破碎,又糅合搀杂

如上举栗例就被阉割去精髓,而割裂又往往连带糅杂。如《铤》目引《释名》,中腰截断,而中间又夹杂着《集韵》。夹杂的方式多种多样,有一书而插入他书者,有远隔他书而绞乱前书者,有突然“夹带”己文者,又有以己意塞进注解者。只举两例,以示其失。如《柿》目引《齐民要术》(简称《要术》)“榿枣”,塞进注解:“红蓝枣,似柿。”按:榿枣即软枣,即柿树科的君迁子(*Diospyros lotus*),以其浆果熟时由黄色变为蓝黑色,故又名“红蓝枣”(虽有枣名,实非枣类)。但由于王祯的插注,致使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误认为“红蓝枣”出自《要术》。《箴》目先引《淮南子》,继引孔融

《同岁论》，而《同岁论》下接称“又曰”，却并非《同岁论》，而实为《淮南子》。其误为抄引《太平御览》（简称《御览》）的失察。此种混乱现象，在王书实非少数。

三、依样葫芦，蹈袭前误

（1）地名，如《砺》目引《尚书·禹贡》，荆州误为扬州，错误根源是蹈袭《御览》卷767“砺”目引《禹贡》的错成“扬州”。《浚渠》目的“广戾渠”是戾陵渠之误，也是蹈袭《御览》卷821“田”目引《魏志》的误文而来。（2）时令，如《锄治篇》的“仲夏之月”是“季夏之月”之误，是承袭曾氏《农书》引《礼记·月令》之误而来。奇怪的是曾氏之误与陈旉《农书》之误雷同。（3）名物，如《蓑》目的莎草“又名薛”，“薛”是“蓍”字之误，是承袭《六韬·龙韬·农器》的误字而来。按：薛是薊蒿，是蒿类，不能作蓑衣；蓍是莎草科的莎（suō）草（*Cyperus rotundus*），多年生草本，叶片线形，古时用作蓑衣材料。二字相差甚微，承误已久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六韬》亦误作“薛”。王氏袭而不察，只是照葫芦画瓢。

四、掇抄前人不标明出处

此类极多，仅举两例，却使人很惊异：《牛》目抄录了南宋周必大为曾之谨《农器谱》所作的序文一大段，周必大不同意牛耕始于三代之说，以“愚谓不然”发挥己见，“愚”当然是周必大自称，可王氏也照抄“愚谓不然”，变成自己的话，实感意外失常，因为王氏没有标明出处，而是以自己叙述的方式出现的。如不查明根源，势必没周而自炫。

也有不标明出处而误书者，如《大豆》目说：“获豆之法贵晚，盖早则零落而损实也。”此条实出《要术·大豆》篇，它记载：“收刈欲晚。（自注：此不零落，刈早损实。）”按：大豆品种有容易裂荚与否的不同，裂荚在成熟之后，青豆是不会裂荚的。容易裂荚的自然应该早些收获，以免晚了“零落”地下。《要术》所述的品种是不易裂荚的，所以不妨晚收，早收了反而子粒没有充实饱满受损失。但王氏改为“早则零落”，却违背了植物生理规律，既是“贵晚”不裂荚的品种，早也不会零落。如不查根源，将给贾思勰抹黑。

忠实地一一标明出处并不妄改一字的优良作风,在古农书中《齐民要术》首创典范,其后《农桑辑要》继承其传统,但到《王氏农书》全给破坏了,他的随心所欲是首开先例的。

五、断章取义出差错

只举一例,略加说明:《木绵序》中引裴渊《广州记》:“蛮夷不蚕,采木绵为絮。”但这“木绵”不是棉花,而是木棉科的木棉(*Gossampinus malabarica*,即攀枝花)之类。毛病出在断章取义。原来《广州记》在“采木绵为絮”之下接着还有:“皮圆当竹,剥古绿(终)藤,绩以为布。”按:攀枝花的蒴果绢状纤维很短,不能纺纱,只能充作枕芯等的填充材料,即所谓“采木绵为絮”。“絮”即指攀枝花的短绒,亦犹称柳花之为“柳絮”,芦花之为“芦絮”,非谓棉絮、茧絮。“圆当竹”即篋筴竹,“皮”是动词,是说利用篋筴竹的秆皮纤维织布(岭南“竹布”出产很早)。“古终藤”才是棉花,是阿拉伯语棉花 *Kutum* 的音译。所记“絮”和“布”对举,指明竹布和棉布为一类,而攀枝花的填充“絮”又是一类,岭南人分别加以利用。王祯截取前句,不顾后句,又不细察,误把攀枝花当作棉花。

六、以偏概全

这类问题也不少。只举两例:《橄榄》目说:“余甘惟泉州有之。”其实闽、广、滇等地都有分布,吴时薛莹的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已有记载,明代閩閩为本书嘉靖本作序也说:“往泛昆明则食之。”《黍》目说:黍“当暑而生,暑尽而收。”扣在“暑”字上做文章,偏囿一面,而黍有春种,亦有秋收。

七、以古套今

只举两例:《井》目说:“汤旱,伊尹教民田头凿井以溉田,今之桔槔是也。”据考古发掘,商代已有用木橐挖成的木桶汲取井水,但是否用于灌溉,不明。至于桔槔,更有待于实物的参证。《耒耜》目的《汉书》记载秦人“借父耒耜”,王氏说就是现在的耒耜,但颜师古解释是耒和耜两种农具,究竟怎样,也有待实物的出土。

八、地区观念问题

只举三例:《荔枝》目说:“生岭南、巴中、泉、福……及二广州郡皆有

之。”《橄榄》目说：“生岭南及闽广州郡。”按：二条均源出《本草图经》（均不标出处），荔枝条是：“生岭南、巴中。今泉、福……及二广州郡皆有之。”橄榄条是：“生岭南。今闽广诸郡皆有之。”毛病出在荔枝删去“今”字，橄榄竟改“今”为“及”。《本草图经》所谓“生”，指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载产地，接着说“今”，则是《本草图经》当时（北宋），其叙例一律如此，时代分明。但王氏一删一改，则“广”及“二广”同在岭南，犯了同地相斥之病，也就是二广同岭南闹“独立”，就不对头了。《屨》目引《方言》“东北朝鲜洌水之间”下删去“西南梁益之间”句，致使原是西南一带的方言变成了几千里之外的东北朝鲜等地的方言。

九、时代观念问题

只举三例：《小豆》目的“今世”云云，实出《要术》，但不揭示书名，“今世”变为王祯当时。《榆》目说：“昔沛丰岁饥……”实出《本草衍义》，所记为北宋嘉祐年间（1056—1063）事，相差250多年。《木瓜》目引述的产地，“山阴”句出在《名医别录》，“西京”句出在《本草衍义》，“宣城”句出在《本草图经》，都不标出处，而时代远隔，一在南朝，一在北宋，却糅合着“一锅煮”当作当时的事。

十、数字核计问题

《耒》目说，从耒下的“庇”量到耒首是三尺三寸，又从耒首量到“庇”也是三尺三寸，合计为六尺六寸。奇怪，同一物体的同一段距离，只是一来一回量了两遍，怎么可以来回相加共为六尺六寸？又，《大车》目引《考工记》说：大车“牝服二柯”。按：《考工记·车人》原文是“二柯有参分柯之二”，即牝服（车箱）的长是“二柯又三分之二柯”，柯长三尺，二柯又三分之二，共长八尺，所以郑玄注说：“牝服长八尺。”王氏只截取半句，全长只有六尺了，而“柯”为斧柄，用以度量车的构件的长短，现在车箱短了两尺，车的规格怎样度量，怎样标准化？

十一、误认和误解

这方面也是不少的。误认，除攀枝花误认为棉花外，再举一例：《橄榄》附载“余甘”说：“其子梭形，又如梅实[核]，两头锐。”但实际仍是橄

榄,并非“余甘”。按:橄榄科的橄榄(*Canarium album*)和大戟科的庵摩勒(*Phyllanthus emblica*),咀嚼后其味都是先涩后甘,所以有“余甘子”的共名。但橄榄果形如梭形“两头锐”,庵摩勒果形球形如弹丸,小于橄榄,如上文所记,正是橄榄,而非同名“余甘”的庵摩勒。王氏因同名而误认。这项材料出自《临海异物志》,但《要术》引该书没有误认。

误解,也举两例,都在《葵》目:先是说:“种出少室山中。”再说:“又一种,花有五色者,名曰蜀葵,不可食。”这二条同出《本草图经》,都不标出处。按:上条原文是:“生少室山。”彼所谓“生”是指《神农本草经》当时著录此药时发现的产地,但王祯欢喜改字,一改“种出”就南辕而北辙了——变为原产地。下条原文是:“花有五色:白者……黄者……”,是分指各种。蜀葵是锦葵科的 *Althaea rosea*,二年生草本。夏季开花,花冠颜色不同,有红、紫、黄、白等种,则《本草图经》所记完全符合实际。也是给王氏一改,将分指者连为一句,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一株或一花而具五色,如非误解,至少表达不当。

十二、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

存在不少,只举两例:《荏蓼》目引《要术》:“荏油性淳,涂帛胜香油。”“香油”原作“麻油”,一字之改,铸成大错。按:《要术》所谓“麻油”,指大麻油,非指芝麻油的“麻油”,但王氏这样误认,所以改为“香油”,可是芝麻油之又叫香油,《要术》时代根本无此称谓。油的油性不同,用途亦异。大麻油和荏油都是干性油,涂在物体表面会氧化结成一层固体的膜,所以可用来涂帛(油布)作雨具等。芝麻油为非干性油,从来没有用来涂帛的。正因如此,《要术》还特别用芝麻油熬制成润发油,因为它润泽头发。如果用荏油就糟了,因为它会氧化使头发干硬胶固,所谓“焦人发”。荏油和香油不同类,怎能比较优劣?一字之差,谬以千里。

《葱》目说:“二月、三月出,移种之。”此实出《要术》,亦未标明出处。《要术》原文只是:“二月、三月出之。”没有“移种之”的话。也只是“移种”二字的蛇足,同样谬以千里。按:《要术》栽培的是作为三年生栽培的大株型大葱,以吃葱白为主。《要术》记载很清楚,即当年阴历七月下种,